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5.05.004

# 论毛泽东和邓小平政治生涯的第一次“落起”<sup>①</sup>

——以“邓、毛、谢、古”事件为中心

刘征

(信阳师范学院 马列部,河南 信阳 464000)

**摘要:**邓小平第一落中的“邓、毛、谢、古”事件,标志着邓小平成为拥护、捍卫毛泽东正确路线和思想的代表人物,奠定了两人长期而巩固的政治关联;“邓、毛、谢、古”事件后,在毛泽东的影响下,“第一起”的邓小平迅速成为人民军队的重要将领;毛泽东的“邓毛谢古情结”成为邓小平“第二起”的关键因素。“邓、毛、谢、古”事件契合了邓小平和毛泽东在革命实践、政治经历和思想路线等方面的一致性,在毛邓关系史上起着助推器和润滑剂的作用。

**关键词:**毛泽东;邓小平;“邓、毛、谢、古”事件;“三落三起”

**中图分类号:**D91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5)05-0021-08

## On Mao Zedong and the First “Down and Up” in Deng Xiaoping’s Political Career: Focusing on “Deng Mao Xie Gu” Event

LIU Zheng

(Department of Marxist-Leninist Studies,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nyang 464000, China)

**Abstract:** “Deng Mao Xie Gu” event during Deng Xiaoping’s “First Down” marked Deng Xiaoping as the representative figure who advocated and defended Mao Zedong’s correct line and ideology, and laid a long-term and stably poli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Deng Xiaoping and Mao Zedo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ao Zedong, Deng Xiaoping realized his “First Up” and rapidly became an important high-ranking military officer of the people’s army after “Deng Mao Xie Gu” event. Mao Zedong’s “Deng Mao Xie Gu complex” was key to Deng Xiaoping’s “Second Up”. “Deng Mao Xie Gu” event, which coincided with the common in the revolutionary practice, political experience, ideological line and other aspects between Deng Xiaoping and Mao Zedong, played a booster and lubricant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o Zedong and Deng Xiaoping.

**Key words:** Mao Zedong; Deng Xiaoping; “Deng Mao Xie Gu” event; “Three Downs and Three Ups”

“三落三起”是邓小平政治生涯独特而重要的经历。在邓小平的“三落三起”中,后两次“落起”发生在“文革”期间和“文革”结束后;第一次“落起”则发生在土地革命时期,二者相距三四十年,故而第一次“落起”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特殊性。众多研究表明,邓小平的“三落三起”都与毛泽东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说,邓小平“三落三起”都和毛泽东相关;故而研究毛邓关系问题,邓小平的“三落三起”是一个重要的接点。本文拟在吸收学界相关零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邓、毛、谢、古”事件

① 收稿日期:2014-12-20

基金项目: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2012BDJ002)

作者简介:刘征(1971-),男,河南桐柏人,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

为中心,较为系统地探究毛泽东和邓小平政治生涯第一次“落起”的交集及其影响,由此揭示邓小平“三落三起”的内在关联,反映两大伟人的交往脉络,推进对两人生平业绩和思想发展的深入研究。

## 1 邓小平因认同和坚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反对和抵制王明的“左”倾错误而被打成“邓、毛、谢、古”事件中所谓“毛派的头子”,遭遇政治生涯的“第一落”:邓小平成为拥护、捍卫毛泽东正确路线和思想的代表人物

邓小平政治生涯的“第一落”发生在1930年代的中央苏区。作为与毛泽东一起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优秀代表,亲历大革命失败、领导百色起义受挫和率领红七军转战失利的邓小平,痛切感受到“左”、右倾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危害,渴望找寻到一条适合国情的正确革命道路。1931年8月到达中央苏区后,看到根据地蓬勃发展的革命局面,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对比,邓小平确信“山沟里长出的马列主义”具有旺盛生命力,确认毛泽东开辟的革命道路的正确,进而对这条道路的创立者毛泽东产生了钦佩。邓小平“对毛泽东早期创建农村红色根据地的成就怀有敬意,邓小平本人也曾做过这方面的尝试,但是没有成功”<sup>[1]50</sup>。毛泽东的成功探索和思想理论魅力无形中深深吸引了邓小平。邓小平女儿邓榕认为:“如果说,在红七军的时候,父亲虽心存异议,但还被动地去执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话,那么,这一次,在中央苏区,他则是毫不犹豫地、旗帜鲜明地对‘左’倾错误身先士卒地进行抵制和斗争。”<sup>[2]308</sup>在实际工作中,邓小平开始自觉反对和抵制“左”倾错误,拥护和执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与此相联系的是1933年1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迁到瑞金后,迅即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严厉打击坚持正确路线的有实践经验的领导干部。3月,继在福建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后,他们又在江西开展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党内务实派受到错误斗争,是为“邓、毛、谢、古”事件。在多次的批判斗争中,邓小平等人被指责为进行“与毛泽东有关系的派别活动”,被指控为“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同时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sup>[3]210</sup>。5月,邓小平被撤销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职务,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下派到边沿的乐安县南村区委当巡视员,后又指定到宁都县七里村监管劳动。为“划清界线”,妻子金维映同他离婚。这就是邓小平“三落三起”之“第一落”。中央苏区反“罗明路线”斗争的实质,是反对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为全面推行“左”倾路线扫除障碍。正如后来博古在党的七大所言:“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有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sup>[4]315</sup>在这场企图使毛泽东“威信扫地”<sup>[5]260</sup>的严重党内斗争中,邓小平认同和坚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反对和抵制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邓小平的政见同毛泽东的思想主张相一致。在实际工作中,邓小平亲眼目睹了中央苏区的伟大成就,亲身感受到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因而逐渐形成了与毛泽东相同的看法和政见。如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反对“城市中心论”,不赞成“向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主张“坚壁清野”、“诱敌深入”消灭敌人,反对军事冒险主义,不赞成把敌军挡在根据地大门外硬拼;主张各种武装力量都要发展,反对用削弱地方武装的方法来扩大主力红军;认为根据地中心区和边缘区工作应有所区别,不能采取同样方法;主张平均分配土地,“给富农以经济出路”,反对“左”的土地分配政策,等等。邓小平的上述主张,是经革命实践检验的成功经验,表明他在思想上与毛泽东是完全相通的,这为“左”倾教条主义者所不容。

其次,邓小平在实际工作中执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这突出表现在邓小平坚决贯彻毛泽东制定的土地革命路线上。在担任瑞金县委书记期间,邓小平从实际出发,积极推行毛泽东为瑞金制定的土地革命的方针和政策,抵制苏区中央局根据“左”倾路线作出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深受群众欢迎。他宣布,坚决维护原先依据毛泽东的正确方针和政策进行的土地分配的成果。在领导土地分配过程中,邓小平坚持实行毛泽东提出的“平均分配土地”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政策。他特别强调,土地分配既不能损害中农利益,也不要过分打击富农。由于邓小平实行了毛泽东的正确土地路线,抵制了“左”的错误政策,从而使在瑞金等县的土地革命顺利开展,取得了显著成绩。

再次,邓小平为政治困境中的毛泽东辩护。邓小平和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对“左”倾教条主义者动辄对中央苏区工作批评指责的行为甚为反感。在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上,在讨论《政治决议案》等

文件时,邓小平等人都表示不同意决议案中对中央苏区工作尤其是对毛泽东的批评和指责,并列举大量事实来支持毛泽东的看法,公开同“左”倾领导人争论。针对教条主义者批评毛泽东是“狭隘经验论”、攻击毛泽东的主张是“山沟沟里的东西”的论调,他们反驳说:“大城市里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沟里,却是马克思主义。”他们戏称那些从上海大城市来的“左”倾教条主义者为“洋房子先生”,即他们脱离实际,而“洋房子里才不会出马列主义的”,这些人“只会在洋房子里死背教条”<sup>[3]209</sup>。

最后,邓小平在批斗中坚持原则,维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残酷的批判斗争中,邓小平被迫作检查。尽管承受着巨大压力,但在原则问题上始终没有作丝毫让步。他一直坚持自己执行的是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只承认工作中有缺点和不足,坚决不承认参与逃跑路线和反党组织。他在《会寻安工作的检查》中陈述了自己所坚持的观点和做法,对强加给他的一些不实之词坚决拒绝。在中共江西省委召开的全省党的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上,针对种种指责,邓小平就革命道路等问题,同“左”倾代表进行了激烈争辩。面对会场内外群情激愤的局面,邓小平坚定地说:“我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写的都是真话。”<sup>[6]112</sup>会议的总结中说,邓小平等人虽然受到“严重打击”,但他们并没有在思想上“解除武装”<sup>[3]211</sup>。中央局代表作出的《关于江西罗明路线的决议》指出:“党大会以后虽经党与之斗争,仍没有什么转变。”<sup>[3]212</sup>对此,外界评论道:“当他(邓小平)认为自己正确的时候,就决不向错误的判断低头。他支持毛泽东的策略,在这一点上,谁也无法使他动摇。”<sup>[7]118</sup>邓小平在“邓、毛、谢、古”事件中坚持真理和不向谬误低头的大无畏精神,本身就是对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坚定维护,这可以说是毛泽东后来对其重要评价“政治思想强”的最早注脚和最好例证。

需要指出的是,彼时“左”倾教条主义者打着共产国际大旗,把持着党中央领导权,对持不同意见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大有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之势;他们的主要斗争对象毛泽东此时已经靠边站,两种政治力量的对比是非常明显的。当时邓小平同毛泽东并没有太多交往,在中央苏区两人“只见过一面”;他既不是毛泽东的直接部下,也不是老苏区干部;而且到苏区时间亦不长。但邓小平不顾形势顺逆,不计个人得失,毅然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展示了一位年轻革命家的气魄和胆识,也体现了邓小平对毛泽东理论路线的深刻理解和坚定信心。

总之,1930年代邓小平之所以被打成“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而遭受磨难,主要就是执行了毛泽东所主张的政策和做法,也就是所谓“毛派的头子”。邓小平在此时期的革命实践和在“邓、毛、谢、古”事件中的坚定立场,充分表明早在中央苏区时期,邓小平就已经开始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坚定地思想和政策上接受毛泽东的教导和影响,成为拥护、捍卫毛泽东正确路线和思想的代表人物。“可以断定,在中央苏区时期,邓小平同志已经认定了或看准了毛泽东创立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这个问题上,他比其他领导人认识要早些,而且在此后的生涯中从未动摇过。”<sup>[8]</sup>故而说,邓小平“不愧为坚持毛泽东正确路线、抵制王明‘左’倾错误的杰出代表”<sup>[9]</sup>。这一事件也足以说明“邓小平是最早理解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极力支持毛泽东的人”;“邓小平是不管形势顺逆,不惜个人前途命运,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肝胆相照的真正革命家”<sup>[10]</sup>。1930年代的这场党内斗争,天然把邓小平划入了毛泽东正确路线这一派别里面。

## 2 邓小平“第一落”时,备受“左”倾路线打击的毛泽东正处于事业的重大挫折时期,坚持实事求是路线的毛泽东和邓小平,在患难与中共建立起深厚的革命情谊:奠定两人长期而巩固的政治关联

大革命失败后,经过秋收起义、井冈山风云、进军赣南闽西斗争和三次反“围剿”作战等的艰辛探索,毛泽东已经初步找到一条适合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但是他的一系列正确主张,却被“左”倾教条主义者讥讽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他的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本本主义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等正确思想,被指责为“狭隘经验论”等论调;毛泽东本人也遭受排挤,被迫离开党和军队的实际领导岗位,屡次遭遇重大挫折。而毛泽东革命生涯受到的最大一次挫折,是在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统治中央期间,遭到错误批判,并被剥夺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sup>[11]</sup>。对此,毛泽东后来说,从1931年到1934年,我在中央根本没有发言权<sup>[12]69</sup>。对邓小平来说,他的“第一落”是陪落难的毛泽东“受罪”,是有多重深远意义和积极影响的。

在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和路线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被撤销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他在中央苏区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也开始受到排挤。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对毛泽东和他在红军中实行的战略战术原则进行了错误批评和指责。会后不久,临时中央撤销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这就解除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权,迫使他暂时离开了军队。自此,毛泽东离开军事领导岗位长达两年多时间,在党和军队的重要决策上,都失去了发言权。而在战争年代,一旦失去军权,就失去实际领导权,就没有说话的分量。这对“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兴趣亦在主持战争”的毛泽东来说,是一个沉重打击。

此后两年里,毛泽东的处境更加艰难。博古到中央苏区后,加大了对毛泽东的攻击和孤立,凡是支持毛泽东的党和军队干部都受到批判,于是就有了前述反“江西罗明路线”等的党内残酷斗争。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提议免去他的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毛泽东只剩下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虚衔。在一段时间里,毛泽东甚至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不仅如此,博古等还继续批“邓、毛、谢、古”,追查所谓的“小组织派别活动”。博古曾说:“毛泽覃、谢唯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还不满,这是派别活动。”<sup>[5]258</sup>并以限制派系为名,限制他人同毛泽东交往。他的亲属也因受牵连而遭到打击,特别是弟弟毛泽覃一直挨批,被撤职,要追查他的“反党活动”,并以开除党籍相威胁。总之,从1931年11月赣南会议到1934年10月长征开始,整整3年时间,毛泽东都处于十分艰难的境地。

对在中央苏区遭遇的事业的最大挫折,毛泽东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在后来的岁月中,他多次以悲愤的心情回顾这段惨痛经历。在1960年12月67岁寿辰之际,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回忆起这段异常艰难的处境时说:“不让我指挥军队,不让我参加党的领导工作。我就在一个房子里,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我也不找任何人,因为说我搞宗派主义,什么邓、毛、谢、古。其实我连邓小平同志的面也没有见过。”<sup>[13]</sup>1965年8月,在接见一个外国代表团时,毛泽东又谈起那段“鬼都不上门”的历史:“他们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我们反对那一套过‘左’的政策。我们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可是我们被孤立。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sup>[4]333-334</sup>毛泽东的悲愤之情难以释怀。可见,1930年代“左”倾错误造成的人生和事业的严重挫折,使毛泽东在感情上受到很大伤害,所产生的愤懑曾长期郁积在毛泽东的心灵深处。

无独有偶,邓小平也多次回顾历史上毛泽东的这段遭遇以及自己与毛泽东的这一特殊交集。1972年12月,第二次复出前的邓小平在赣南参观毛泽东旧居时,触景生情,感慨地指出:“毛主席在当时,也是受排挤、受打击的。”<sup>[14]1966</sup>1973年10月,在韶山参观毛泽东旧居时,邓小平回忆起当年和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因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而被“左”倾领导人一起被打成“毛派”分子的情景,动情地说:“毛泽覃是个好同志。如果参加长征,也许不会牺牲。”<sup>[15]1415</sup>1977年9月,在会见日本新自由俱乐部访华团时,当谈到自己被打到的经历时,邓小平回忆说:“在江西根据地,王明路线夺了毛主席对红军、对苏区的领导权,还反对什么邓毛谢古路线。我算一个头头,叫‘毛派头头’。”<sup>[16]201</sup>1989年5月,在同两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邓小平明确指出:“三十年代在江西的时候,人家说我是毛派,本来没有那回事,没有什么毛派。”<sup>[17]301</sup>当然,邓小平不认同自己是“毛派”,而是党内的“实事求是派”。

自八七会议上邓小平初次见到毛泽东后,两人联系并不多,工作上也没有过多交集。两人有比较直接的工作关系,是从邓小平进入中央苏区以后开始的。而“邓、毛、谢、古”事件,则是邓小平第一次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与毛泽东“结缘”,而毛泽东此时又处于“落难”的特殊时期,邓小平也从此受到毛泽东的格外注意。如果说八七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与邓小平见面还没有深入了解的话,那么“邓、毛、谢、古”事件则给他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使他真正认识和发现了邓小平。通过这一事件,毛泽东“开始注意到邓小平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sup>[18]</sup>;邓小平“从此被毛泽东认为是一条战壕里的人,是可以信赖的人”<sup>[19]</sup>;该事件“使毛泽东长期相信邓小平是忠实于自己的”<sup>[1]46</sup>。邓小平在“邓、毛、谢、古”事件中的坚定立场,赢得了毛泽东的高度信任,奠定了他与毛泽东长期而巩固的政治关联。

总之,在1930年代的中央苏区,毛泽东和邓小平因思想相同、观点相近而相知相识,逐渐走到一起。在此基础上,两人都受到了“左”倾路线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被撤销领导职务,有着共同的坎坷经

历。“峥嵘岁月患难与共”，共同的遭遇和磨难则把两人更加紧密地联在一起。“毛泽东不得意之日，亦是邓小平受挫之时，二人在患难中建立友谊，在曲折中加深认识。”<sup>[20]</sup>“这使毛泽东和邓小平彼此更加了解，关系更为密切。”<sup>[21]</sup>为此，建国后毛泽东在回顾历史时，曾感慨地认为：凡是我倒霉的时候，罗荣桓都是跟我一起倒霉的，邓小平也差不多<sup>[22]</sup><sup>316</sup>。在共同的革命事业和患难与共的经历中，坚持实事求是路线的毛泽东和邓小平，建立起真挚而深厚的革命情谊。

### 3 随着遵义会议党内正确路线的确立，“第一起”的邓小平迅速成为人民军队的重要将领，为他日后成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打下坚实基础：“不可或缺当时已经主导我党我军工作的毛泽东对他的格外关注”

民主革命时期，作为一直坚决贯彻毛泽东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邓小平的政治生涯随着毛泽东的命运变化而发生着休戚与共的转变。作为中国革命伟大转折的遵义会议，既是毛泽东政治生命的根本转变，也是邓小平政治生涯的重要转机。遵义会议前夕，毛泽东的正确意见逐渐在党内获得支持。在毛泽东的影响下，“第一起”的邓小平调任中央秘书长，并参加了遵义会议。正如1980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时所言：“在1935年我们历史上著名的长征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军队的领导。相应地，我那时也第二次当党中央秘书长。”<sup>[23]</sup>而遵义会议对“左”倾错误的批判，则实际上取消了错误路线强加在邓小平头上的各种“帽子”，邓小平也最终实现了从“落”到“起”的转换。邓小平就由之前的受打击排挤转为受到信任和重用，转换到关键而重要的岗位上来，从而得以充分施展他的才干，开始了他后来更为光辉的革命历程。正是在遵义会议确立正确路线的基础上，“第一起”的邓小平得以成为“几十年里革命武装力量和党的领导层的一位主力成员”<sup>[24]</sup><sup>85</sup>。

遵义会议后，随着毛泽东领袖地位的逐步确立，邓小平在军队的职务不断提升，迅速成为人民军队中独当一面的高级将领。从1935年6月到1938年1月，在较短的不到三年的时间内，邓小平的军队职务先后有6次大的调整。第一次是1935年6月，中央决定调邓小平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第二次是1936年5月，邓小平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第三次是1936年12月，中革军委决定邓小平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第四次是1937年6月，中革军委决定邓小平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第五次是同年8月，邓小平担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第六次是1938年1月，中央军委任命邓小平为129师政治委员。可以看出，这一时期，邓小平的职务几乎是每隔半年变动一次，其提升速度是异常快的。

如此频繁的职务调整和快速提升，在邓小平军事生涯中甚至在人民军队历史上都是较为罕见的。个中原因，除了邓小平本人才干突出、时局演变迅忽和革命工作迫切需要外，还与邓小平在“第一落”中政治磨难的历练有关。因为“受过打击的人，他对于另外一方面的问题考虑得比较周到”，所以“有没有在党内经过斗争的经历，其见识和智慧是不一样的”<sup>[25]</sup>；更重要的是“经过党内斗争，邓小平的工作热情、心态情绪和信念都没有改变”<sup>[26]</sup><sup>9</sup>；人生中的第一次政治磨难，磨砺了邓小平的思想、品格和意志，对他的成长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当然，更与通过“邓、毛、谢、古”事件认识和发现了邓小平才干的毛泽东的信任、器重和提携密不可分，“不可或缺当时已经主导我党我军工作的毛泽东对他的格外关注”<sup>[27]</sup>。史料表明，以上数次职务调整，其中的第二次和第四次职务变动都是毛泽东亲自提议的<sup>[3]</sup><sup>258</sup>。其他几次尚无史料证明是毛泽东直接提议的，但肯定也与毛泽东有关联。如邓小平由中央秘书长转为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毛泽东为此解释说：前方需要加强，小平同志很有才干，所以调他到前方去，让他更好地发挥作用<sup>[3]</sup><sup>235</sup>。

上述职务调整的第一次，即邓小平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对邓小平的事业发展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因为红一军团是毛泽东亲手创建的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之一，到红一军团工作，使视“打仗”为其“专业”的邓小平重新回到军事斗争第一线，而且进入到主力红军队伍并担任重要领导职务，这对他后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成为人民军队主力部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所以这次职务调整，对邓小平“个人事业发展是至关重要的”<sup>[3]</sup><sup>236</sup>。邓小平正是在此职务的基础上，迅速跃升为人民军队的重要将领。还有第六次职务调整，即邓小平出任129师政委，此时的邓小平还不到34岁，是八路军三大主力师中最年轻的政治委员。从此，邓小平走上更重要的领导岗位。邓小平和师长刘

伯承密切合作,使129师打出赫赫威名,并成为以后著名的“刘邓大军”和第二野战军的前身,他本人也得以成为一个方面军的一把手。故说,“邓小平经历了突如其来的第一次打击之后,迅速上升到我们党的军队的重要岗位上来。”<sup>[28]180</sup>从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到129师政委,邓小平从事的都是军队政治工作,“军队政治工作的经历,奠定了邓小平作为一名伟大的军事家的基础。”<sup>[29]</sup>邓小平担任人民军队重要将领,为他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干提供了广阔舞台,开始了他与毛泽东更为广泛而深入的交往与合作;而邓小平在革命战争年代不负毛泽东信任,勇挑重担,敢打敢拼,出色完成党中央交付的各项任务,立下卓越功勋,则为他日后成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打下坚实基础。

总之,1930年代邓小平的第一次“落起”与毛泽东的政治沉浮紧密相联,荣辱与共。“毛泽东受排挤,邓小平跟着挨整;毛泽东出山主政,邓小平就摆脱逆境。”<sup>[30]203</sup>尤其是“从长征后期到抗战初期,邓小平的处境一步步好转、职务一步步提升都与毛泽东在党内地位的逐步提升相关联。”<sup>[31]</sup>还要看到建国后的历史演进。1956年9月,在筹备中共八大期间,毛泽东在称赞邓小平杰出才能的同时,特别强调:“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sup>[15]996</sup>这赞扬了邓小平与自己一样经历过党内斗争考验,即与“左”倾路线作过坚决斗争,其中应包括邓小平“第一落”中的“邓、毛、谢、古”事件。毛泽东讲这话时,明显带着他自己的人生体会。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议,邓小平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达到“第一起”的“顶峰”<sup>[32]450</sup>。邓小平从中央苏区“毛派的头子”,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 4 “邓毛谢古情结”使毛泽东对1930年代的这场党内斗争,特别是对邓小平在斗争中的立场和表现念念不忘,在重大历史关头屡次提及:“文革”中毛泽东保留邓小平党籍和邓小平“第二起”的关键因素

邓小平“第一落”中的“邓、毛、谢、古”事件,对毛泽东具有特殊意义和难忘印象。一方面,毛泽东本人当时也因为反对“左”倾路线而被剥夺了领导权,遭遇了人生和事业的重大挫折。他一直认为,批“邓毛谢古”实际上就是批他,打击“邓毛谢古”就是打击他本人。另一方面,“邓毛谢古”四人中的“毛”就是他的胞弟毛泽覃,其他人都是与他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这四人除邓小平外,另外三人都先后在土地革命时期英勇牺牲了,毛泽东为此非常痛心。故而对“邓、毛、谢、古”事件及其唯一的幸存者邓小平,毛泽东始终怀有特殊感情,并铭记在心,念念不忘,在若干重大历史关头屡次提及,而且情有所系、意有所指。纵向来看,“邓、毛、谢、古”事件与毛泽东关系之密切、在毛泽东心目中所占分量之重,历史上毛泽东对此事件提及次数之多、时间跨度之大和感怀之深,在某种程度上可称为毛泽东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邓毛谢古情结”。

先看建国前的历史。毛泽东曾经对贺子珍愤怒地说:他们搞所谓的反“罗明路线”,实际上在反我;他们抓所谓的“邓毛谢古反党小集团”,实际上是要抓“反党小集团”的头头我毛泽东。王明他们已经摆开架势,要往死里整我毛泽东了<sup>[33]</sup>。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对党的历史上处理干部的错误决定,包括邓小平等人被“无情打击”的问题,“亦应取消”,应予“平反”<sup>[30]171</sup>。在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一九三三年反邓、毛、谢、古‘右倾机会主义’的一篇文章,实际上是指鸡骂狗的。”<sup>[9]</sup>在1943年1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深情地谈到10年前的“江西罗明路线”,认为:反邓、毛、谢、古是指鸡骂狗,邓、毛、谢、古死了三个人,希望邓要为党争气<sup>[34]</sup>。短短一席话,深深道出了毛泽东对这一事件性质的看法和对邓小平的期许与鼓励。可见,毛泽东一直认同“邓、毛、谢、古”事件与自己的紧密关联,并把邓小平作为党内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来褒奖。

再看建国后特别是“文革”中的历史。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期间,毛泽东提出邓小平与刘少奇“要有区别”,特别指出:“苏区邓、毛、谢、古,他(邓小平)是反对王明的”<sup>[15]1364</sup>。联系到之前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针对有人提出要开除邓小平党籍的鼓噪,毛泽东力主保留了邓小平的党籍,从而保住了邓小平的政治生命。显然,毛泽东的这一讲话是借谈邓小平的历史功绩,用以保护邓小平,为其问题的处理留有余地。可以说,由于“邓、毛、谢、古”事件的深远影响,在“文革”这一特殊年代,“即便在毛泽东让激进派批邓时,也绝不同意把邓小平开除出党”<sup>[1]46</sup>。这在邓小平“第三落”时,毛泽东对其政治命运作出“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的处理中也得到突出体现。1973年,毛泽东提出坚持正确路线要有

“五不怕精神”，即“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罢官，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sup>[35]53</sup>。这段话公开见诸报端，正值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之际，也许是毛泽东从邓小平身上勾起对历史往事的回忆，有感而发，可见邓小平当年面对打击的勇敢表现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之深和毛泽东的赞许之情。1975年5月，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毛泽东回顾党的历史，着重谈了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危害，再次提到42年前的“邓、毛、谢、古”事件，指着在座的邓小平说：“其他的人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sup>[36]1733</sup>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任和推崇溢于言表。此后，邓小平进一步受到重用，先后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日常工作。可见，毛泽东对邓小平在“第一落”中的突出表现和历史功绩始终没有忘记，并予以积极肯定和高度评价，给予特殊对待。

尤其要提到对邓小平“第二起”起重要作用的毛泽东的“8·14批示”。1972年8月3日，邓小平致信毛泽东，提出出来工作的请求。8月14日毛泽东阅后，写了一段重要批示：“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文末，毛泽东强调指出：“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sup>[15]1393</sup>“文革”开始后，毛泽东对邓小平的问题作过多次表态，但以书面批示的方式比较全面明确地论及邓小平的历史功绩，这还是第一次。这个较长的近两百字的批示，显示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几点基本评价。在这些评价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毛泽东肯定了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站在以他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的，并因此遭受批判和处分”<sup>[37]</sup>。进一步看，毛泽东首先特别强调邓小平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意在中央苏区时期，坚决拥护和实行毛泽东关于红军反“围剿”作战和根据地建设的正确主张的人物中，邓小平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放在历史的长河中看，毛泽东把邓小平称为“毛派的头子”，意在一些重大问题上，邓小平一直是其正确主张和路线的坚定支持者，这是毛泽东对邓小平在党的重要历史转折和革命斗争实践中展现的政治风范的高度评价。这个批示对“第二落”的邓小平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意味着他的政治生命开始复苏，实际上“为邓小平的第二次复出打开了大门”<sup>[38]</sup>。故而说，邓小平在中央苏区被打成“毛派头子”的历史遭遇，是毛泽东重新起用邓小平的一个首要而关键的因素。

总之，1930年代邓小平因拥护毛泽东而遭受打击迫害的经历，可以说“毛泽东是记得的，而且整整记了40年”，一直记到“文革”之时。历史在以后的岁月里乃至40年后给予了邓小平特殊的补偿。故而邓榕认为，邓小平在“第二落”后之所以能受到毛泽东的起用：“30年代的‘邓、毛、谢、古’事件，的确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sup>[2]315</sup>并认为此事件“成为决定父亲政治生命的相当重要的因素之一，而且是好的因素，积极的因素”<sup>[2]313-314</sup>。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可以说，邓小平在“邓、毛、谢、古”事件中被打成“毛派头子”的历史，在毛泽东心目中积淀之深，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内化为“文革”中毛泽东一直保留邓小平党籍、在重大历史关头起用和重用邓小平的一个重要心理因素。正是“邓毛谢古情结”蕴含的信任和器重，才有了“文革”中毛泽东对邓小平在被打倒后的刻意保护和邓小平复出后受到重用，就有了邓小平令人瞩目的“第二起”和更为辉煌的“第三起”。

## 5 结语

综上所述，毛泽东与邓小平政治生涯的第一次“落起”发生了密切交集，其中的“邓、毛、谢、古”事件对毛邓关系，特别是对邓小平以后的人生和事业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邓、毛、谢、古”事件把邓小平和毛泽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两大伟人“相识相交的开始”，建立起两人患难之交的深厚关系，打下了二者相互信任、长期合作的坚实基础，进而影响毛邓关系40余年甚至更长时间。而把邓小平和毛泽东紧密联系在一起深层次因素，则是在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实践活动中，两人不谋而合地坚持的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可以说，“邓、毛、谢、古”事件高度契合了邓小平和毛泽东在革命实践、政治经历和思想路线等方面的一致性；使邓小平认识了毛泽东，毛泽东发现了邓小平，从而使两人“彼此更加了解，关系更为密切”；故而可以说，该事件是连接毛泽东和邓小平关系的纽带和关节点，在漫长的毛邓交往关系史上起着助推器和润滑剂的作用。从邓小平角度看，其“三落三起”之第一次“落起”架起了他与毛泽东革命与友谊之交的桥梁，而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路线，对困境中的毛泽东的坚定支持和拥护，奠定了两人相知相悉的基石，埋下了毛泽东对邓小平长期信任与关爱、器重与提携的种子，深刻影响了邓小平后来的政治生涯尤其是后两次“落起”以及党和国家的历史发展。所以笔者认为，邓小平政治生

涯“第一落”中的“邓、毛、谢、古”事件,是我们研究毛邓关系等重要问题绕不开的一个关键点。忽视了这一事件,许多问题都无法说清。从分析毛泽东和邓小平政治生涯第一次“落起”的交集及其影响入手,相信一定会把毛邓关系问题和与之相关的其他重要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

### 参考文献:

- [1] 傅高义. 邓小平时代[M]. 冯克利,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 [2] 邓榕. 我的父亲邓小平:战争年代[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小平传(1904—1974)(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 [4] 金冲及. 毛泽东传(1893—1949)[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 [5] 李维汉. 回忆与研究(上)[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
- [6]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委. 邓小平在江西[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
- [7]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长征新记[M]. 北京:新华通讯社,1986.
- [8] 刘培平. 邓小平理论的思想渊源[J]. 文史哲,1998(5):40-46.
- [9] 傅伯言,余伯流. 邓小平与中央苏区的反“罗明路线”[J]. 党的文献,2004(5):58-64.
- [10] 刘惠德. 邓小平维护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历史考察[J]. 黑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2(2):48-50.
- [11] 彭厚文. 毛泽东怎样对待不公正待遇[J]. 党史博览,2012(1):4-7.
- [12] 胡哲峰,孙彦. 毛泽东谈毛泽东[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
- [13] 毛泽东. 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J]. 炎黄春秋,1993(7):2-4.
-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小平年谱(一九〇四——一九七四)(下)[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小平传(1904—1974)(下)[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 [17]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8] 黄少群. 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政治生涯[J]. 百年潮,2014(12):9-13,50.
- [19] 周一平. 毛泽东选接班人的心路历程(下)[J]. 探索与争鸣,2014(6):88-94.
- [20] 詹国枢. 毛泽东怎样发现了邓小平[J]. 政府法制,2011(11):16.
- [21] 江英. 一部全景式的邓小平政治传记——温乐群著《邓小平之初》评介[J]. 党史研究与教学,1994(4):73-76.
- [22] 王力. 王力反思录(上)[M]. 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
- [23] 周锟. 邓小平六任秘书长[J]. 秘书工作,2014(8):26-29.
- [24] 巴拉奇·代内什. 邓小平[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 [25] 曹应旺. 邓小平的大智慧[J]. 党史博览,2012(10):9-13.
- [26] 陈晋. 走近邓小平[M]. 北京:同心出版社,2004.
- [27] 未毅军. 周恩来与邓小平的“落”和“起”[J]. 党史博采(纪实),2014(1):15-20.
- [28] 赵晓光,刘杰. 邓小平的三落三起[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
- [29] 蒋永清. 邓小平一个鲜为人知的自我评价[N]. 北京日报,2014-6-30(19).
- [30] 余伯流. 伟人之间:毛泽东与邓小平[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
- [31] 王香平. 回望邓小平的前七十年——《邓小平年谱(1904—1974)》编者访谈录[J]. 党的文献,2010(2):93-99.
- [32] 龚育之. 独特的超越:龚育之自选集[M].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 [33] 何立波,宋凤英. 共和国成立前的邓小平与毛泽东[J]. 党史博览,2004(8):20-25.
- [34] 李君如. 历史:毛泽东论邓小平[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7(1):10-17.
- [35] 路小可. 邓小平的非常之路[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 [36] 逢先知,金冲及. 毛泽东传(1949—1976)(下)[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 [37] 彭厚文. 毛泽东怎样欣赏和培养邓小平[J]. 党史博览,2013(12):4-9.
- [38] 郑克卿,常志. 毛泽东七评邓小平[J]. 党史博采(纪实),2005(3):20-22.

(责任校对 廖和平,朱正余)